



中国书史讲稿

(初稿)

刘国钧编

1956年級用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油印

1956年9月

中国书史讲稿 [初稿]



录

第一章 图书的社会意义

第二章 从文字发生到公元一世纪末的中国书

第一节 文字的发生和图书的起源

第二节 初期的中国书（从远古到公元前五世纪末）

第三节 私人著作的发生、发展和帛书的出现（从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中叶）

第四节 秦及前汉时代的中国书（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一世纪末）

第三章 从公元第二世纪到第八世纪的中国书

第一节 纸的发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初）

第二节 初期的纸书（公元第二世纪至第五世纪）

第三节 石经及推托方法的出现（公元三世纪）

第四节 写本书的极盛时期（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

第四章 从公元第八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中国书

第一节 印刷术的发明（公元七、八世纪之间）

第二节 初期的雕版印刷事业及印刷的书（公元第八世纪至第十世纪前半）

第三节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公元十一世纪）

第四节 两宋时代的图书和出版事业（公元十世纪后半至十三世纪前半）

第五章 从公元第十三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书

第一节 元代的图书和出版事业（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

第二节 明代的图书和出版事业（公元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中叶）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图书和出版事业（公元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期）

第四节 我国印刷术之向国境外传播

第六章 从公元十九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书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我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演变及这时期出版物的社会政治意义

第二节 初期的铅印书和出版事业（十九世纪初叶）

第三节 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的图书和出版事业（1840~1911）

第四节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的图书的出版事业（1912~1919）

第七章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书（1919~1949）

第一节 「五四运动」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图书和出版事业（1919~1927）

第二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图书和出版事业（1927~1949）

第八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和出版事业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政策

第二节 我国国民经济复兴期间的图书和出版事业

第三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图书和出版事业

第四章 从公元第九世纪到十三世纪末叶的中国书。

(自唐朝後期到宋末)

第一节 印刷术的发明

自公元九世纪起，印本书籍在我国已经出现。从此以后，印刷术成为制造书籍的主要方法，由我国传播到全世界。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关键。全世界卓越的思想家都深刻地了解这件事对于社会和文化进步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印刷术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强大的发明，是发展和巩固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本前提之一。雨果甚至把印刷术的发明认为是「一切革命的胚胎」。没有印刷术，书籍就不能大量生产，知识就不能普及，人类的文化就不能有很快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内容也不能像现在的丰富多采。

什么是印刷术呢？印刷术就是将文字制成版，在它上面加墨，印刷纸上而成为读物的方法。印刷术基本上有两种：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也叫整版印刷术，就是将文字反刻在一块整的木版或其它材料的版上，在这整版上加墨印刷的方法，活字印刷术是先刻成一个一个的单字，依照著作内容，将两个单字拼凑成一块版，再就版上加墨印刷字法的。这些单字称为活字，活字印刷是现代印刷术的主要方法。绝大多数的现代书籍是用活字印刷术印成的。所以它的发明对现代文化的关系更加重要。但没有雕版印刷术作为先驱是不会有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的。

这两种印刷术都是我国劳动人民发明的。我国人民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后来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我们生在现今印刷术发达的时代，把印刷书籍看作很平常的事，很难想像到当初没有印刷术时读书的困难，因而也就不容易体会到印刷术对于

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如何地伟大而深远。但我们可以断言，如果印刷术至今还没有发明，那我们的学术和文化绝不能像今天这样的发达，这样的光辉。

我国之所以能够发明印刷术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印刷术未出现之前，我国已有了好几种复制文字的方法，可以说是印刷术的先驱。

首先是石刻的捶拓这大约在西世纪时就已有了。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刻的字取得复制本的方法。

其次是印章，秦汉以后，多用阳文印章。纸流行之后，封泥失去效用。水印代之而起。这就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刻的文字取得复制本的方法。

道教徒扩大了印的面积，在上面刻了许多字。东晋（五世纪）抱朴子的书中提到一种刻有一百二十字的符印。这已经是一篇短文了。

用印的方法是盖印——印在纸上。捶拓的方法是刷印——石在纸下。扩大印章的面积，应用拓碑的方法来取得成品就是印刷术了。所以印刷术可以认为盖印和拓碑的方法的结合和统一。

此外，在唐朝还有许多「千佛像」就是在一张纸上印上许多小小佛像。这些像完全相同，可见是用同一的印印成的，这就是说，刻了一个佛像小印把它在纸上印了许多次而成，这应该认为是版印的起源。后来在佛像旁边或下面出现了佛名，后来又出现在佛像下面刻上一段佛经。这样就成了文字和图画相结合的佛像画片了。这种画片在敦煌表现了很多。可惜都没有标明时代，但从其作风上看，可以断定其中有一些是唐代的，也许它们就是最早的印刷物。

唐朝还流行印花布，布的图案是印的，这也可以认为是一

「延昌用十四年甲寅一家有恶狗行人慎之」等残缺不完的文字。有人认为这是印刷物，并且因为延昌三十四年（这都于吐鲁番的高昌国年号）相当公元五九四年即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就断定文世纪时已发明了印刷并且已传播到高昌。但是周一良先生说得好，这张片「文句像是门口或墙上的招贴，而且附有年月，似乎没有雕印许多份的必要，敦煌所发现的早期印本，字体都古拙凝重，毫无流利之感。而这纸片上的字却非常生动优美俨如手书，比起元明时名书手写刻的书稿还有过之。我想即使文世纪高昌有了印刷术，雕版的技巧一定还不能精妙到这样程度，所以不可能是雕版。大约写时先用笔毛很硬转折有棱角，墨色又浓，湮埋日久，因而像是印本了」。周先生的结论是很正确的。我还要附加几句。第一，「延昌三十四年」等字是夹在文句之中的而不是在题写年月的地方（文的首或尾）的，即使这残片真是印刷的，也不足以证明还是那年的刻本；第二，如果文世纪高昌已有这样优美的印刷而这印刷术是高昌自己的发明的，那么，不至于在高昌及其附近地方一类的印刷物痕迹都没有。如果说是由中国传去的，那么由中国到高昌的路上，不至于那时期的印刷物一类都没有。所以把这个残片说成是印刷物是难以置信的。

总之，关于隋朝已发明印刷的证据都不够充分。因此我们以为隋代发明印刷虽不是不可能，但还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

关于印刷发明时期最可靠的说法是唐代发明说。

「旧唐书」文宗本纪有如下的一条记载：「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制历日版」。这明明白是禁止人民私印日曆的事。「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圣策第二，指云这是由于当时宋州节度使冯宿的奏请，而「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也转录

「延昌用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并残缺不完的文字。有人认为这是印刷物，并且因为延昌三十四年（迁都于吐鲁番的高昌国年号）相当公元五九四年即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就断定六世纪时已发明了印刷并且已传播到高昌。但是周一良先生说得好，这纸片「文句像是门口或墙上的招贴，而且附有年月，似乎没有雕印许多份的必要，敦煌所发现的早期印本，字体都古拙凝重，毫无流利之感。而这纸片上的字却非常生动优美如手书，比起元明时名书手写刻的书稿还有过之。我想即使六世纪高昌有了印刷术，雕版的技巧一定还不能精妙到这样程度，所以不可能是雕版。大约写时再用笔毛很硬转折有棱角，墨色又浓，湮埋日久，因而像是印本了」。周先生的结论是很正确的。我还要附加几句。第一，「延昌三十四年」等字是夹在文句之中的而不是在题写年月的地方（文的首或尾）的，即使这残片真是印刷的，也不足以证明还是那年的刻本；第二，如果六世纪高昌已有这样优美的印刷而这印刷术是高昌自己的发明的，那么，不至于在高昌及其附近地方一类的印刷物痕迹都没有。如果说是由中国传去的，那么由中国到高昌的路上，不至于那时期的印刷物一点都没有。所以把这个残片说成是印刷物是难以置信的。

总之，关于隋朝已发明印刷的证据都不够充分。因此我们以为隋代发明印刷虽不是不可能，但还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

关于印刷发明时期最可靠的说法是唐代发明说。

「旧唐书」文宗本纪有如下的一条记载：「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制历日版」。这明白地禁止人民私印日曆的事。

「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圣策第二，指出这是由于当时宋州节度使冯宿的奏请。而「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也转录

了冯宿的奏文。文中说：「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日曆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太和九年是公元八三五年。可見此時已有印刷的日曆了。

王浣在「梧林」內記「僖宗入蜀，大史曆本不及紅紫，而市有印賣者，尚差互朔晦，貨者各征市侯，因爭執」。

唐僖宗逃入成都是中和元年即公元八八一年的事。隨着唐僖宗到成都的柳玭，在其「泉訓」序里說：「中和三年癸卯夏，僖宗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于重城之東南。其書漢陽田采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刻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尽曉」。從這段記載里，可見在八八三年不僅有印刷的曆書，而且有印刷的其它書籍了。

大約在比這稍早的時期司空圖寫成「為東都教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一文，題下小注「共八百紙」。文中提到在這以前寺中既有印成的佛經，在唐武宗禁佛時散失。武宗禁佛是會昌五年（八四五年）的事，可見這時已有印刷的佛經了。

還該提到長慶四年（八二四年）元稹為白居易長安集作序，中有「繕寫模勒，銜賣于市井」的語句，下面自注「揚越間多作書模勒宋天及子尚一」。一般都把「模勒」解釋為刊刻，那麼，九世紀初就有了印刷了。不過有人根據北宋蜀刻本長安集元稹自注中「模勒」作「模寫」，認為把序中「模勒」解釋為「刊刻」還有疑問。但如果「模勒」就是「模寫」，那「繕寫模勒」，就成了重文疊義，不合文法的句子了。

以上都是唐朝人文献中自己说明唐宋九世紀已有印刷的。

宋朝人离唐不远，也如此说。例如：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卷下）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

唐代刻本在敦煌发现的印本书中已有实物可见。最著名的

是一种「金剛經」，末尾明白載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珣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九年即公元八六八年。这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有日期的雕版印刷书籍。这是一个长约一丈六尺的卷子。本文由六个印張粘綴而成，前面还粘有一幅题为「祇树给孤独园」的画，画着释迦佛在祇园精舍向長老須菩提说法的故事。画和字都雕刻的渾樸凝重，精美異常；墨色浓厚勻称，清晰显明，这一切都表明是印刷术发明已久，技术已臻熟練，绝不是初期的出品，由此可作云结论，说，印刷术的发明。当远在公元八六八年之前，很可能在一百多年以前。

日本存有宝龟元年（公元七七零年）的四神印本陀罗尼經。这是八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可以作为八世纪已有印刷术的佐证。

要完全确定印刷术的发明年份是相当困难的。首先是印刷术并非突然出現的方法而是如上面所指示的，逐渐由印章，印佛等發達而來，中間沒有截然的界限。其次是印刷术是由人民大众所逐渐累积起来的經驗，首先在一般人民中間出現流行，而人民生活中的新鲜事物。不等到它仍足以影响士大夫们的生活时是很少受到知识份子的注意的，因而也就不能見于他們的記載。有很多事实说明，印刷术已如纸一样最初只流行在人民中間，随后为佛教徒所採用，最后才为統治阶级知识份子和政府所接受。因此，要确指一个什么年份或一个什么人作为发明时期和发明人是差不多不可能的。

但是根据上面所引的文献和实物来看，认为印刷术发生在七八世纪之間而在九世纪后半就已经相当发达是比较妥当的。

第二章 初期的印刷书籍及印刷事业

在上节中说明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后期（九世纪）已经流行

。这时的刊物已有日曆、佛經、文集、字書、小學以及陰陽占卜等類的書。刊刻書籍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

必須注意：這些刊印的書大多數是人民大眾日常所需用的。日曆是一切居民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需要量最大。字書、小學是人們識字教育的工具。凡是要想識字的人都可以使用它。文集方面，只提到白居易元稹的詩集，而白居易的詩則在當時是婦女兒童以及外國（朝鮮）人都喜歡誦讀的，陰陽占卜至是迷信，但在當時社會里非常風行，几乎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佛經則是為了宣傳教義，必須予以大量傳播的著作。可見當時刊刻的書都是有大量生產的必要的。只有對同一書有大量需要時才有刊印的必要。只有人民大眾所需用的東西才有大量需要。所以印刷術首先被應用來生產人民大眾所需用的圖書，正是理所當然的。人民創造了印刷術來滿足自己對圖書的需要，當時的佛教徒很早就採用這個新方法来為宣傳服務。因為當時的佛教還處在上升的階段，所以有勇氣採用新發生的方法。

當時刻書的地點遍及四川淮南江南一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這些地方都是盛產森林的地方，也是當時產紙最多的地方。第二、唐代自安祿山亂後，黃河流域爭戰連年殘破不堪，文化因而衰落，而四川淮南江南一帶比較安寧，文化尚能滋長。

四川似乎就是當時刻書的中心。柳玭在成都所見到的印本書種類很多。朱翌說：「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咸通年間在長安留學的日本僧人宗叡攜帶回國的書籍目錄（新書寫清未法門等目錄）中明白標為「西川印子」的有唐韻和玉篇各一部。所謂「西川印子」就是「四川印本」的古稱。可見四川印書的多了，很可能四川就是印刷術的發源地。

不幸的是唐代的刊本在現在已成「鳳毛麟角」了。上面所

讲到的咸通九年本金刚经刻本在敦煌只发现中和二年和乾符四年的残本白曆。可惜都被斯坦因盗去，藏在大英博物院中。敦煌还正有许多没有年代残本的印刷物，其中也许有唐刻在内，但很难证明。日本中村不折曾得着吐鲁番五土的妙法莲华经，中有武则天所改新字，因而有人认为这是武氏不远的时期（八世纪初）的刊物。如果的确，应是目前最早的刊物。但也有人对此怀疑，认为是伪刻。还有待于决定。此外，还有几种号称唐代刊本的书，如所谓永徽六年刊行的阿毘达磨大毘婆娑论及开元杂报，都经人指出或是误解或是伪造，不可置信。

总之，唐朝中叶以后有了刻印的书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唐代刊本之留存到现在的实在太少了。

当印刷术已经在民间流行的时候，统治阶级为了划一考试所用的经典文字，还採用了漢武帝时的旧法。这就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八三七）在国子监所立的石经。这次石经共有十二种，用楷书书写，后世称为「开成石经」。这件事反映出统治阶级是如何忽视新事物的作用，是如何地保守！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标准的，没有错误的书本是如何地为读书人所需要。然而直等到差不多整整一百年后五代时唐明宗長興三年（九三二年）儒家经典才开始有雕版。

唐明宗長興三年，由于宰相馮道李愚的奏请，「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业所业本经句段，抄写注疏，子细看读，然后石版台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原本交錯」。（见五代史要）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开雕。当时计划刻印九种经书，即易·诗·书·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仪礼、周礼和礼记。但其中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在后汉时才计划开雕。后周太祖广順三年（九五三年）九经全

部完成，一共費了二十年。參與校刻工作的有馬衡，陳觀，段
顯，田敏等人；而田敏更是二十年中始終其事的一人。

刊刻九經的目的，正如歷代刻石經的目的一樣，是校正經
典文字，使讀書人有標準的讀本。其所以引起刊刻動機的乃是
有鑒於市上印版書籍的流行。馮道，竇愿在其奏疏中说：「嘗
見吳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美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
定，惟專流行，深益於文教矣」。（見冊府元龜）可見政府之
採用印刷本是受了民間印刷書籍流行的刺激的。

從此以後，政府刊刻書籍的事業開始了。在九經刻成之後
，同时还刻了「五經文字」，「九經字样」二書，隔后又刻了
陸德明所著「經典釋文」。由於這次刊刻事業是由國子監所主
持書版也藏在國子監，所以稱為「監本九經」。過去有人認為
印刷本是五代時發明並把發明之功歸於馮道，就是由於誤解這
一事件所引起的。

五代的時候，不但有了官刻的經典，並且在士大夫階層內
也有了私刻書的人。前蜀田頔尚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
吉寫文選，初學記，白氏大帖鑒版。和凝也刻了自己的文集計
有一百卷之多。還有蜀休和尙也雕刻了自己的文集禪月集。這
仅是零碎的記載。但已可看出這時印刷本的作用已經為統治階
級上層知識份子所認識，而他們也就開始利用這項重要武器了。

另一方面，民間及佛教徒的刻書事業仍然向前發展，敦煌
發現的書籍中有五代刊刻的韻書殘本，還有許多上圖下文的佛
像畫，都可作為證明。

五代的刻本，像唐代刻本一樣，流傳到現在的非常的少所
以存的幾種都是在敦煌發見的。而且都是殘本。監本五經雖然
很受當時讀書人的重視，但一本也沒有保存下來。

唐和五代時的刻本是我國書史上最早印刷的書籍。在書史

和印刷史上都有巨大的意义。在九世纪时，印刷术已臻于相当优美的境界，不仅有刊刻的文字，而且有刊刻的图画。版图的刊刻技术在印刷术一开始时就产生了。这都是我国文化史上极光荣的事情。

关于这时期刊印的书籍，王国维先生有《五代监本考》（见王国维先生遗书），向达先生有《唐代刊书考》（见国学季刊第一一年刊）都是首创的著作。

第三节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活字印刷术是现代印刷术的主要方法，在今天已发展到机械化、电气化的地步，是现代文化的一根主要支柱。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学者一般地都把活字印刷术认为是十五世纪中叶（一四五〇年）日耳曼人谷腾堡的发明，并且把活字印刷术和印刷术等同起来，而认为谷腾堡就是印刷术的发明者。这显然是歪曲了事实。首先，铅字印刷术不能限制于活字印刷术。雕版也是一种主要方法，而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所发明，已经是颠扑不破的事实。所以谷腾堡不是印刷术的发明者，是毫无疑问的。其次，活字印刷术尽管对于欧洲人来说有更重大的意义。尽管谷腾堡是欧洲第一个应用这个方法的人，但是确实的证据告诉我们，活字印刷术的首次发明权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而且是由中国传到中东和近东的。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谷腾堡（或者别的人）是在这个影响之下才“发明”拉丁文字的活字印刷术的。

活字印刷术是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一〇四一——一〇四八年）我国天才工人毕昇所发明的。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后在

與鉛皆為版本。灰脂中有布心畢昇又為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一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鉄板，其上以松脂脂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鉄板置鉄板上，凡欲布字印滿鉄板為一版，持就火燒之。稍鑿，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鉄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版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單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其鑿，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之。

這就是活字印刷術最早的方法。這方法比起今天的活字印刷術來，自然是笨拙得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鑄字、排版、印刷這三段基本過程——活字印刷術的基本原則在這裡都已具備。已後的发展就是技術改進的問題了。

畢昇所发明的活字，后世称之为泥活字。有人认为在他以前就有了铜活字。例如有人说后晋天福年间（十世纪初叶）就有了铜活字版。但是这样的书却没有人见过，并且也没有书上记载过。片语隻字，难以置信。在今天说来，最早最详细的记录是属于毕昇的。

不幸的是关于毕昇的生平我们知道的太少，除了沈括这一段记载外，尚直没有别的材料。他一共印了些什么书，我们也无从查攷。

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后，显然没有得到广大流行。雕版印刷术一直是那时印刷事业的主要方法。这是有它的社会原因

的在活字印刷过程中，排版是很费时费工的；只有印大量的书籍才觉得它方便。沈括评说这方法说：「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这句话非常恰切。总之，对于一本书没有同时大量的读者是活字印刷术不能广泛流行的原因。这是和我国历史发展有关的。

虽然如此，在毕昇以后，我国活字印刷术还是得到继续不断的改进和发展，在以后各章内将随时指出。

第四节 两宋时代的图书和出版事业

两宋时代（九大。——一二七八年）是雕版印刷术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代所出版的书籍是有名的「宋版书」。它们在书籍制度上遗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直到目前我们的雕版书籍在形态製作方面基本上还是和宋代一样的。

宋朝统一中国之后，经过一段恢复之期，国民经济得着进一步的表展。生产力提高，商业经济逐渐发达，社会渐趋富裕。文化事业因而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反映到图书方面，就是著作种类的增多，出版范围的扩大，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出版事业的发达。

宋代的学术活动是相当积极的。北宋初年政府就编纂了太平御览、册府元典、文苑英华三部各一千卷的大参考书。经学方面，由于注重义理，发展出理学。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是影响很大的理学家。还有与他们主张不同的王安石（北宋）陆九渊（南宋）等。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了高峯。史学方面有最著名为编年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有郑樵的资料性的通志。在这时期也开始了金石学（考古学）的研究。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传古图考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也开始出现了目录学的著作。郑樵的《校讎略》是现存最早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尤袤的《遂山堂书目》是开始记录各种不同版本的藏书目录。而官修的《崇文总目》以及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晁公武的《群书读书志》都要它们的提要著名。医学和应用科学也有相应的发展。例如大观本草、营造法式等都标志着有关科学的新成就。文艺方面，词和评话是这时代的剧作。私人文集更是丰富，不仅刊刻文集的人数众多，而且许多文集都达到几百卷的巨帙。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印刷术的发展，而由印刷术发展所带来的便利也刺激了更多人从事著作。

此外，由于科学制度的确立，使得读书人对教科书（经典）和参考书（各种类书及应试用书）的需要更加迫切，这就使得出版事业有经济企业化的可能，引起一些人愿意在出版方面投资而逐渐形成独立的出版业。

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会推动印刷技术的提高。在这时期不仅雕版印刷更加精美，并且表明了活字印刷。还引起纸张等印刷材料的改进。而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改进又反过来刺激了著作物的增加和便利了著作物的出版。宋代的著作保存到现代的远比宋以前为多，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印刷发达的关系。

宋代的出版物遍及于当时所有的各个知识部门。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医药、农业、工业、天文历法、诗文集、词集、小说、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以及民间日用必需的书籍，民间文学等，都陆续有了刻本，而儒经、正史、医书、佛经等尤为有名。

宋代刻书地区几乎遍于全国。在北宋初年蜀（四川）为最盛。这是绍袭五代的风气的。到北宋末期，杭州刻本最为精美；开封印版不减于杭州，但纸不佳；蜀本渐退化；福建刻书多而质劣。当时的叶梦得曾说：「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故不能久。」（见《石林燕语》）。南宋时代，杭州（